

治理“霸树”，关键在规范“怎么拍”

时评

陈玺撼

每当春暖花开时，公园绿地里就容易出现“霸树”的尴尬现象——树下最佳拍摄点被反光板、补光灯、折叠扶梯和服装箱层层包围，拍照打卡者占着好位子长时间不走，市民游客只能“望树兴叹”。

对此，很多市民游客抱怨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社会上关于“驱逐商拍”的呼声不断。而探讨解决之道时，有一种观点得到较多认同，那就是把专业拍摄用具或商拍团队挡在门外，禁止入园；或者开辟专区，让需要长时间拍摄的个人或团队预约付费使用。

按照需不需要长时间拍摄，把游客分成两拨，分开管理。这样的方法看似能够精准解决问题，实则陷入了“身份对立”的误区。

首先，以身份为标准的拦截，面

临界定难与执行难的现实尴尬。在上海，少数公园曾尝试通过区分“谁在拍”来解决，效果并不理想。

对于禁止专业拍摄用具入园，因为公园管理方无权对市民游客携带入园的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所以这些用具就会被藏在衣服下面、大包小包和手推车里进入公园。

更何況，上海打造“公园城市”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提升公园绿地的开放度。越来越多的公园打开围墙，成为无缝衔接周边街区的开放式公园，24小时公园，市民游客随时可从四面八方而来，要限制专业拍摄用具入园，几乎不可能。

对于禁止商拍团队入园，这也缺乏操作性。几个人算商拍团队？带多少专业拍摄用具，“霸树”多久算商拍团队？这就很难定义，更难识别。

在这一点上，美国、新加坡一些公园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鉴。他们以“行为强度”划分游客，商业、团队拍摄行为必须提前申请许可，重点审核拍摄的规模、使用器具、时间、区域。如果现场发现未经审核擅自开展活动的，或者阻碍步道、攀折花木、在敏感地区使用闪

光灯的，不分身份一律驱离。国内一些公园绿地的柔性举措也有参考价值。上海辰山植物园主动联系一些小红书的博主、B站UP主，帮助他们挖掘、推广“人少景美”的樱花打卡点，从而引导游客避免扎堆在樱花林入口，还增加“种草文”里植物、园艺等知识的厚度，公园、游客、平台都能从中获益。

优秀的园林设计和活动策划，也能引导客流“不必单恋一枝花”。辰山植物园在樱花大道设计了三种颜色各异的空间：灰色的水泥路，主要用于电瓶游览车、手推车的行驶；绿色的黑麦草草坪，主要用来增添观赏体验；大道两侧黄绿色的结缕草草坪耐踩踏，引导游客去搭帐篷、铺野餐垫。很多人发现，坐在比樱花林高的两个草坡上，风景更美，于是纷纷放下手机、相机，享受岁月静好。

公园的本质，是人人平等享用的公共空间。公园管理的智慧，也蕴藏在规则的公平设计中。治理拍摄乱象，应该摒弃“商拍=违规”“游客=合规”的二元思维，而应坚守不影响他人的公共底线

一旦错位，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次，试图开辟“拍摄专区”来解决矛盾，可能引发新的不公。公园本身具有公益属性，如果将本就不紧张的公共资源再挤出一部分，给少数人提供便利甚至用来牟利，这与公众的诉求背道而驰，将造成新的不公平，进一步激化矛盾。

其实，“霸树”矛盾的本质从来不是商业拍摄与个人游玩的对立，而是越界行为对公共权利的侵占。比如，如果拍摄占用时间过长、空间过大，就会损害多数人的公共权益。普通游客拍三五张照片即离开，不会引发不满；但同一人在树前反复摆拍几十分钟、多人团队架设拍摄道具占用核心景观并拒绝退让，才是矛盾爆发的核心。

因此，治理“霸树”现象的关键，不是区分“谁在拍”，而是规范“怎么拍”——不分身份、只看行为、不搞歧视、守住公共底线，才是兼顾公平与实效的破局之道。

在这点上，美国、新加坡一些公园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鉴。他们以“行为强度”划分游客，商业、团队拍摄行为必须提前申请许可，重点审核拍摄的规模、使用器具、时间、区域。如果现场发现未经审核擅自开展活动的，或者阻碍步道、攀折花木、在敏感地区使用闪

光灯的，不分身份一律驱离。国内一些公园绿地的柔性举措也有参考价值。上海辰山植物园主动联系一些小红书的博主、B站UP主，帮助他们挖掘、推广“人少景美”的樱花打卡点，从而引导游客避免扎堆在樱花林入口，还增加“种草文”里植物、园艺等知识的厚度，公园、游客、平台都能从中获益。

优秀的园林设计和活动策划，也能引导客流“不必单恋一枝花”。辰山植物园在樱花大道设计了三种颜色各异的空间：灰色的水泥路，主要用于电瓶游览车、手推车的行驶；绿色的黑麦草草坪，主要用来增添观赏体验；大道两侧黄绿色的结缕草草坪耐踩踏，引导游客去搭帐篷、铺野餐垫。很多人发现，坐在比樱花林高的两个草坡上，风景更美，于是纷纷放下手机、相机，享受岁月静好。

公园的本质，是人人平等享用的公共空间。公园管理的智慧，也蕴藏在规则的公平设计中。治理拍摄乱象，应该摒弃“商拍=违规”“游客=合规”的二元思维，而应坚守不影响他人的公共底线

让陌生人“蹭热点”，可能“引狼入室”

信息安全专家还提醒：非必要不连接公共网络，务必及时更新手机系统

求证辟谣

最近，上海一知名主持人发布视频称，他和朋友似乎遇到了手机共享热点骗局，希望公众提高警惕。

有读者看到新闻后问，为什么共享手机热点会有风险？记者调查发现，将自己的手机热点分享给他人，可能“引狼入室”；将自己的手机连接他人的手机热点或免费网络，同样风险不小。此外，使用手机的“无线快传”功能，也存在一定风险。

不轻易开启热点

该主持人在视频中介绍了疑似遇到骗局的经过：当时，他和朋友在羽毛球馆打球，有陌生女孩称手机停机，希望他的朋友小田开启手机热点供连接，以便充话费。小田警惕心较高，发现女孩无法自圆其说，便拒绝了。事后，他们查询发现，可能遭遇“分享热点骗局”：不法分子通过连接受害人的手机热点，以盗取受害人手机内的短信验证码、账户信息等隐私。

由于没有分享手机热点，所以该主持人只是推测遇到骗局。那么，从技术角度看，将自己的手机热点分享给他人，真会被窃取信息、盗刷资金吗？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基地副主任、资深信息安全专家沈传宁给

出肯定答复。他解释，分享者开启手机热点功能后，使用方就连接到了分享者的手机网络中。如果使用方是一个攻击者，可以通过网络攻击分享者的手机系统。如果手机系统存在漏洞，攻击方就有机会入侵分享者的手机。比如，攻击者可以在分享者手机中植入木马病毒，窃取通讯录、照片、密码等隐私信息；也可以执行非法操作，包括操作分享者的手机进行转账等。

所以，不与陌生人分享手机热点很有必要。而在日常使用手机时，用户应将热点功能设置在关闭状态。即便是将手机热点开放给自己的设备连接，也要做好安全防护，避免被别有用心者“蹭热点”。

最简单的防护手段是为自己的手机设置相对复杂的热点名称和密码。其中，热点名称不要使用“xxx的Mate”“xxx的iPhone”等系统默认名；密码也要设置得复杂一些，以降低被非法接入和攻击的风险。

随意“蹭网”不安全

被别人“蹭热点”不安全，“蹭”公共网络或他人手机热点同样不安全。

眼下，很多公共场所、商业设施等都会提供免费公共网络。有的手机用户为了节约上网流量，习惯到处“蹭网”。但多名专业人士提醒，有些看起来“正规”的免费网络，未必来自

公共场所或商业设施的运营主体。

免费公共网络也是一种热点，即相关场所运营方通过开放热点的方式，允许他人接入自己的网络。但就像普通手机用户可以修改自己的热点名称那样，公共网络的热点名称也可以随意设置，这就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比如，很多人看到“CMCC”，认为是中国移动提供的热点；看到“Starbucks”，认为是星巴克提供的热点。殊不知，不法分子可以将自己的热点命名为“CMCC”或“Starbucks”，或者将公众熟悉的热点名称略微修改几个字母、增加后缀等，诱导公众连接。如果手机用户接入了伪造的热点，那么上网过程中涉及的敏感信息就可能被伪造热点提供方获取。

沈传宁提醒，非必要不连接公共网络。如果一定要连接公共网络，务必与公共网络提供者确认准确的热点名称，避免被“李鬼”热点误导。同时，使用公共网络时，不要进行高敏感操作，如输入密码、网络转账等。

无线快传也有风险

眼下，很多手机用户还会用手机的“无线快传”功能发送和接收文件。例如，华为的“Huawei Share”、苹果的“Airdrop”等，都属于无线快传。通过这一功能，不仅手机与手机之间能快

速传输文件，还可以跨设备传输。很多用户觉得，这种传输方式不用接入互联网，也不用开启手机热点，是不是更加安全？

事实并非如此。沈传宁说，无线快传总体要比使用公共网络安全。因为无线快传基于品牌自定义的传输协议，并且只在传输双方需要进行文件传输时连接，这些都能降低传输过程中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风险仍旧存在。因为无线快传只是不接入无线局域网进行文件传输，而不是两部手机或相关设备之间不连接。如果用户通过无线快传收到的是攻击文件，那么手机或相关设备将立刻暴露在风险中。

因此，使用无线快传也要注意安全。一方面，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无线快传功能日常应处在关闭状态。只有需要使用时才打开。有部分用户发现，由于开启了无线快传功能，且接收范围设置为“所有人”，导致在公共场所收到来自陌生人的传输请求。专业人士分析，这可能是传输者的误操作，但也不排除不法分子故意为之。

另一方面，使用无线快传功能时，接收者应先确认对方将传输什么文件。对于无法确定文件内容或来自陌生人的无线快传请求，不要轻易同意。

“最后要强调的是，如果收到手机官方发布的系统更新提醒，务必及时更新。大部分攻击会利用手机系统漏洞，而更新升级通常包含已经发现漏洞的补丁。”沈传宁提醒。

本报记者 任翀

留言板

严管严惩守护食品安全

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历时两个月暗访，曝光多地水产市场暗藏的“活鱼麻醉”黑幕。

不少商户为降低活鱼损耗、延长售卖存活时间，违规给活鱼使用麻醉剂，部分黑心商家甚至直接使用剧毒工业酒精，这些被“迷晕”的活鱼未经代谢，直接流向菜市场、餐馆，摆上普通消费者的餐桌，食品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违法成本低，必须重罚严惩

Rice：敢于对食品下手的，应该狠狠打击、惩罚。

祺祥子：政府监管部门要把问题解决好，在萌芽状态，管好该管的事，出了问题要问责。

玉兰花开：还是罚得轻了。

秀兰：只要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解决

不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铭记：对食品产业链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市场管理人員的惡意瀆職，必須严惩不貸，以儆效尤。

新时代：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根源在于执法不严、打击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

监管必须到位，强化源头治理

了然：麻醉品属于管制药品，居然能轻易搞到，源头管控存在严重漏洞。医乃仁术：食品安全任重道远，监督执法不能只靠群众举报。

仁云：触目惊心！希望国家食安部门严查这些害人行为，司法部门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还公民一个安全的食品环境。

本报记者 黄尔麦 整理

“多数中国男性活不过70岁”？未证实信息被喂成“权威”数据

近日，在某些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上，一则“男性死亡年龄中位数仅为67.7岁”的说法被广泛传播，并被进一步解读为“多数中国男性活不过70岁”。不少自媒体在传播时信誓旦旦称其为权威数据，引发了不少读者焦虑。

67.7岁的依据何在？有的自媒体称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有的则称依据联合国的人口报告，还有的说来自中国社科院、人口普查数据等。口径不一，令人生疑。

记者能够查阅到的最新的有关死亡全年龄段的权威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这次普查公布了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分性别和年龄段的死亡人口数据，如果将这数据按全国死亡人口年龄排序取统计学上的中位数，总人口死亡按年龄排序中位数为75—79岁之间，男性死亡按年龄排序中位数为70—74岁之间，无法精确到个位数是因为这份统计数据公布的是年龄段。

记者还去查询了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这份报告统计的2023年中国男性死亡年龄中位数为73岁，这和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是一致的。

无论采用七普数据还是联合国数据测算结果，均明显高于部分自媒体所传播的67.7岁。而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等的官方网站上，也找不到有关67.7岁的结果。

那么，“一半中国男性活不到67.7岁”究竟来自哪里呢？可能如一些自媒体所称：这一数据来自AI大模型。

记者也向某大模型进行提问，果然得到了67.7岁这一结果，大模型说这一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数据”。而记者让其提供搜索来源却发现，大模型的数据来源正是那些自媒体文章。当记者进一步追问这一数据是否是权威数据，大模型却表示“数据存疑”。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人口

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表示，死亡年龄中位数受年龄结构影响非常大，无法客观反映普遍的寿命情况，对存活人群的参考价值也不大。死亡年龄中位数是对某一时期内死亡个体进行的统计，以此推导出一半中国男性活不过67.7岁，相当于静止地看待事物，没有预计到未来的趋势。

彭希哲表示，在上海研究中，“平均预期寿命”更有参考价值。平均预期寿命是当年出生的人在当年各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下预期能生存的平均年数，通过计算消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更能反映人的预期寿命。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25年已经达到79.25岁。而上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2022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2022年上海人口预期寿命为83.18岁，其中男性已经达到了80.84岁，高于全国水平。

专家也提醒，虽然“一半男性活不到67.7岁”这个数字仔细追溯一下就知道存在问题，但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对AI生成内容缺乏辨析，将未证实的信息转发、引用，然后在循环中细节越来越丰富，影响的人群越来越大，这种现象一再发生，已经对公共信息环境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本报记者 崔艺林



建言 投稿 爆料 求助 扫码参与互动

“湘黔滇旅行团”的远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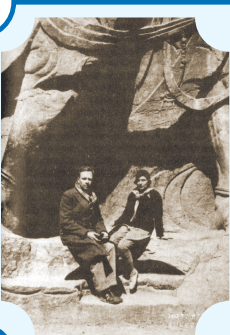
师们刚下了轮船，马上又要坐上滇越铁路上的火车了。

滇越铁路是法国人经营的。全长八百多公里，一半在中国，一半在越南。滇越铁路的起点和终点一在海边，一在云贵高原，两地落差一千八百多米。火车爬坡像老牛拉车，很吃力，全程要走三天，且有许多怪事：白天开车，随叫随停，自由上下，慢慢吞吞；晚上要停车，且不能宿在车上，行李也要随身带走。车从海防开出，经河内，横穿过越南北部，盘山而行，终于到了越南北部崇山峻岭中的老街。进入中国后，第一站是河口，第二站是开远。河口和开远都是小地方，客棧少。车到开远是晚上，有个教师迟了一步，到处找不到住处。好在挑夫是当地年轻人，脑瓜灵，把他的行李挑进法国人开的医院，让老师“住院”，才幸免于露宿街头。

在吱吱作响的米轨里，他们坐着咣当咣当摇晃的火车，折腾了三天，终于到了昆明。

他们还算幸运。因为当最后一拨人员要离开长沙时，广州已被日军占领。海路无法走，只好改陆路。

至于“湘黔滇旅行团”，许多人更喜欢简称它为“步行团”。因为“团员”是以走路为主。全部人员约三百人，其中教师十一人。这一路的学生中许多人家境清贫，走路可节约川资。教师则是自愿的。此番迁校，学校指导思想明确，规定“迁校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要让学生“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身体”。为此，还指派各科教师组成辅导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陈宇 著

团进行专业指导。旅行团实行军事编制，随队还有几名军事教官。全团分成两个大队、三个中队。每人发给黄军装、绑腿、草鞋等。

1938年2月20日，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十一艘挤满步行团成员的木船由两艘汽船拖曳，沿湘江浩浩荡荡顺流而下，驶向茫茫的洞庭湖。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全长八百多公里。喜饭后打篮球“锻炼身体”的东北学生于方彦显得特别兴奋。他的老家一片平原，无高山大川，他正想借这次远途跋涉开开眼界。他和同学们在船舱里，听着波浪拍打着船舷，仰望天上的星星和流云，驶向烟波浩渺、号称八百里洞庭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虽然春寒料峭，冷风飕飕，但他们个个心潮澎湃。一些来自平津大都市的学生浮想联翩，他们听说湘西旅途艰险，土匪出没无常，还要经过不少苗人村寨，那里还有许多神秘奇异的风习。过了湘西，就进入云贵高原了，其地虽荒僻，但风光绮丽。想到前面迎接他们的还有三千里路云和月，真是令人神往。有人情不自禁仰天长啸，咏起古诗：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年轻的心，充满着好奇与浪漫冒险的种种遐想。

船抵达洞庭湖畔的益阳时，他们登岸，然后到了常德，开始了长途步行。

由于此行沿线情况复杂，路途艰险，学校请求当局指派一位高级军官领队指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了一位东北军的中将。他叫黄师岳，任步行团团长。黄师岳年届五十，由于长期行伍生活，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他身材魁梧，为人谦和，忠于职守。学生们都好奇，不知这位统领他们远征的军人究竟怎样，多方打听他的底细。有人说，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后，黄师岳赋闲在北平，还去北大听过课，颇有文化修养。还有人说，他原名叫黄师嶽，因崇敬岳飞，改“嶽”为“岳”。于是，对他增添了几分敬意。临出发时，黄师岳训话，慷慨激昂地说：“在我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化有关的远征有三次。张骞通西域为第一次，唐三藏取经为第二次，三保太监下西洋为第三次。现在我们是第四次了。为了保存国粹，保存文化，我们任重而道远，共同努力吧！”他

的讲话给师生极大的鼓舞。

至于辅导团的教师，真可谓个性迥异，各有千秋。中文系名教授闻一多，年届四十，有人称他“大胡子”。从抗战开始，他就誓须明志，胡子越来越长，他也不理，发誓一定要到抗战胜利才剃须。他不穿军装，头戴毡帽，着灰布长衫，全然一副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模样。他随身总带着画夹画笔，随时可以写生，还带着一杆三尺长的竹烟管，走路时可作杖，休息时可吞云吐雾，消解疲乏。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先学美术，后改学文学。他年龄也不算小，又常年任教于塔里研究学问，是文弱书生。当初，他的老朋友杨振声听说他要参加旅行团，十分意外，待确认后，开玩笑说：“闻一多参加旅行团，当备一口棺材同行。”学生见他身体不佳，也纷纷说：“您是大名人、大教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跟大家一起受罪，何苦呢？”而他却回答：“火车我认识，轮船我也坐过，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步行团里有个生怕太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教育系的黄钰生教授。虽然有人护送他，但黄师岳团长还是不时要瞄他一眼，总怕他丢了。他外穿学生黄军装，很容易淹没在一片黄色的人流里。只有认真观察，才会发现他“大腹便便”，有点像十月怀胎的妇人。他自称“腰缠万贯”，是全团最“阔气”的人。原来他腰里缠着长条大布袋，里面塞满巨款，有银圆，也有大钞。他是全团领导之一，也是后勤部部长，近三百号的柴米油盐 and “绿林朋友”要买的买路钱，全靠他的腰带支撑。盗匪要是劫持了他，无异于成功地抢了一次银行。

(七)

连载

解 放 日 报 连 载 广 告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